●責任編輯：葉衛青 2025年3月19日(星期三) 香港文匯報
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舊夢難忘

沈西城

恐怖電影大師余允抗

一遇到新電影上映，余允抗就會忘個不了，現場的一切，他一把抓。還喜歡聯絡新聞界朋友，一杯咖啡，坐下聊聊，當然不忘宣傳自家的電影，誠懇地要求影評家提意見。一般導演都愛聽好話，即使善意的批評，也不大接受。余允抗大不同，他要聽影評家的心裏話，批評也好，褒獎也好，痛貶也好，照單全收。

首部電影《山狗》公映後，有影評家不留情面地痛斥拍得太血腥殘忍，要是第二個導演，有新作時，大多不會對那位影評家發出邀請，嘿嘿，好個余允抗，反其道而行，奉為上賓。

自古以來，導演跟影評家大都不能同舟共濟，影評家老愛時不時批評導演，導演也往往嚴厲地還擊。過去就有張徹跟女作家孫寶玲就武俠暴力的激烈爭論語，余允抗是少數能跟影評家和平相處的導演。他說：「每個人都有他的觀點，我拍暴力恐怖片，除了是想固立一定重點外，還想說明世界上無處不是講暴力，暴力為什麼存在？」
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他跟朋友成立了世紀電影公司出任董事長，辦公室我去過，很有氣派，進門燈火輝煌，排山倒海的力量迎面襲來，險些氣也喘不轉。余允抗說：「要拍好電影，什麼都要配合，劇本不能馬虎，製作更要認真。」惜乎事與願違，票房並不太好。道理何在？影評家以為是藝術氣味太濃，跟觀眾脱了節。

經一事，長一智。電影不能單求藝術，一定要迎合觀眾。於是在藝術性和商業性之間，余允抗選擇了後者，他是徹頭徹尾的工作狂，工作起來，可以連飯都不吃，起勁地做，一天48小時都不夠用，余綺霞做他的女朋友，實在不易為，雙余之戀，經過長跑，無疾而終。為什麼會這樣？簡單得很，就是允抗兄過於熱衷工作，冷落了女友，可以跟朋友討論劇本，而忽視了跟余綺霞的約會，有哪個女人可以容忍這樣冷漠的對待呢？

1990年，余允抗退出電影圈，轉戰金融界，成就非凡。問他為什麼要捨棄電影？允抗風趣幽默地回答：「電影工作太緊張，易有神經病，我可不想入青山哩！」緊張大師轉作務實商業家，出乎人之所料。說到電影成就，一是香港特級恐怖片先河，二是發掘了夏文汐、葉童，尤其是夏文汐，允抗為二十世紀影壇找來最具味道的尤物，媚在骨子裏，世間難求。

姚弦雅音

姚珏

中國式母女關係

3月10日，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閉幕之後，我沒有馬上回香港，因為這些日子我女兒在北大的燕京學堂，正在認真撰寫她的碩士論文，所以我約了她在北京多待幾日，也是為了能夠母女倆能有一些難得的共處時光。

中國式的母女關係，我覺得就像我們從事文化藝術的特點，既有傳承千年的中華傳統文化之根，也有因應時代變化的新特色。中華傳統文化的母愛就是唐詩中所講「慈母手中線，遊子身上衣」，無私的母愛往往最能治癒人的心靈，常伴遠行遊子的一生。而岳母為岳飛背後刺字「盡忠報國」的故事，則代表中國式母親把中華傳統家國情懷最直接傳遞給下一代。當然在社會發展中，作為一位獨立女性，不僅僅是家庭中的慈母，同樣也是貢獻社會進步、國家富強的傑出人士。我最能體會這一點，既要完成在政協、藝術及教育等方面的工作，同時也要關心女兒的生活和思想的溝通。

但令我高興的是，女兒也在與時俱進地成長，讓我對她未來成為傑出女性和成功媽媽也充滿信心。這次在北京，她帶我去三里屯一家日本餐廳吃飯，食物物美價廉，我感嘆她對北京的了解程度已超越了我。記得30年前的三里屯只有幾個小酒吧，在北京的老外都會去聊天喝酒。

但如今由港商參與開發的三里屯太古里，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，城市更新讓北京舊貌換新顏。30年前那裏的西餐只有番茄意大利麵，但如今年輕一代可以在北京品嘗到的各國美食應有盡有，他們生活的習俗跟喜歡的東西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首先我要為我們國家翻天覆地的改變感到驕傲，我們的年輕一代可以在北京從小接觸多元化、國際化的文化，我覺得他們很幸福。當然我們這些為人父母的，也更需要通過不斷的學習，要跟上時代，特別現在內地的生活習慣都改變了，生活的各方面通過網上都可以輕鬆搞定。我們需要和下一代共同學習、共同成長，通過溝通交流，我們可以把好的經驗傳授給他們，也分享他們新的思想，我想這就是新時代的中國式母女關係。

當然母女關係的分享，最重要的就是「誠」，需要坦誠分享自己的困擾，分享自己的經驗，互相給出真誠的建議。最近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校長徐揚生在對話著名主持竇文濤時說，人工智能時代技術你比不過它，它比你厲害，但人品「誠」是很重要，心誠很重要，誠才有信，誠才是真的，所以是「真誠」。我覺得愈是最親近的人，「誠」就愈需要。「誠」把親情和友情都能融匯相通，女兒跟母親之間的最佳關係永遠會是好朋友，永遠會支持對方成長，因為好的媽媽也是好的女兒，而好的女兒也是好的媽媽。

當代中國式母女關係，反映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傳承和進步，「家是最小國，國是千萬家」，未來深化改革開放，也需要社會從家庭的「誠」進一步入手推動，分享中華傳統文化和價值，凝心聚力共同打開發展新天地。

水過留痕

少爺兵

女性力量不需被定義

每年的三月八日被定為「國際婦女日」，就是大家口中的「三八婦女節」。在活動上有人突然提問：「女性力量是否需要被『定義』？」筆者的腦海中蹦出「為母則剛」這4個字，而同桌的一位演藝人認為女性不需要被定義。

另一位演藝友人則指不少女性已為自己「定義」了，理由是很多已婚的女性在婚後多選擇不再工作，在家中「相夫教子」，樹立賢妻良母形象就已為自己「定義」。雖然亦有不少女性仍獨立，不像古時的妻妾般成為男人的「附屬品」，只是她們都沒有考慮到若不在職場已代表跟社會脱節的問題，若婚姻有什麼變化，想再工作時，職場已不需要她了。所以覺得無論是已婚或仍單身的女性，不要再為自己定義，獨立有工作是生活上重要的一環。

女性急於在某個歲數要將自己「嫁出去」，除了接受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」的思維影響限制外，更重要的是很多女性認為如果沒有丈夫在身邊，會被人嘲笑沒有男人拜倒其「石榴裙下」是一件很丟臉的事，甚至懷疑自己的「魅力何在？」而設下「條條框框」，不能否認還有女性就算明知男方是「渣男」，喜歡在外「拈花惹草」背叛婚姻的大有人在，她們仍「願打願挨」，寧願忍受對方的「不忠」，亦不肯「離婚」；故此女性根本不需要被定義，因為是個人的思想行為，局外人又能說什麼呢！

演藝友人強調完全不是在鼓吹女性不婚，只是想說不論男性或女性也好，在談戀愛雙方「打得火熱」時，智商都會變為「零」，所以對別人的忠告同樣是「油鹽不進」。

男性與女性都不需要被定義，兼且「被定義」這問題根本不要單單指向女性，任誰都要對所作的選擇或決定負起後果責任，才是現世代所要求的「男女平權」核心所在。

百家廊

山的那端，是記憶的根

若荷

初春的陽光，帶着清新與暖意，灑在充滿生機的大地上。在這大好的時光裏，我和先生決定回到我曾經住過的一個村莊——舊寨，這裏有我童年的歡笑、青春的懵懂，還有那些深深烙印在心底的記憶。可以說，這裏是我心靈深處的故鄉。

村子靜臥在一座大山腳下，背後是山，南面有河。小時候，我常站在村口眺望村後那座山，它不高，卻在我的心中有着一股神秘的力量。此次歸來，我決意完成多年的心願，登上那座山。車停在山腳下，踏上山路，轉過幾個彎，才驚覺，這真的是條名副其實的「羊腸小道」，崎嶇蜿蜒，鋪滿滑溜溜的石子，每一步都走得格外小心。山上本無正路，我們只能循着村民踏出的模糊痕跡摸索前行。

走着走着，我們看到了一些殘垣斷壁，那是從前村民為了躲避土匪而壘起的防禦工事。小時候，常聽村裏的老人講當年鬧土匪的故事，那些故事為這座山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，令人心生敬畏。這些石頭壘成的圍牆，雖然已經破敗不堪，但依然能讓人感受到當年村民們為了生存而付出的努力。我們繼續往上走，歷經艱辛，終於登上了山頂。

老人們都說，這是座荒山，山頂既不能住人，也無法開墾播種。眼前的山頂確實荒涼，植被稀疏，幾乎全是石頭。這些石頭經風雨侵蝕，早已變得黢黑，散落各處，其中一些來自坍塌的石屋。屋子空間很小，很難想像，當年躲避土匪的村民，如何在這樣的房子裏生活。老房子旁，有許多黑黝黝的樹枝，伸手觸碰還有些扎人，仔細辨認，我發現那是枯朽的花椒樹的斷枝。再抬眼望去，原來山上竟有這麼多老花椒樹，最粗的碗口般粗細，先生感嘆：「這得有一百多年了吧？」想來，這些花椒樹是當年山上人家所種。在山的東北角，我們還發現了一棵山楂樹，樹幹粗壯，需兩人合抱。

我粗略一數，山頂上，殘屋有二三十間，據說，從前這裏居住過一個村子的人。後面有一口井，早已乾涸，井深約兩米，井口寬闊，一眼便能看到井底。我不禁思索：在那戰亂的年代，在這乾旱的高山頂上，曾經是什麼樣的力量，能讓這口井湧出水花，供給奔向絕境的人們？村子南邊雖有一條河，但山高路遠，山上幾乎找不到水源，故而植被稀疏，植物生長非常艱難。我小時候見過的梯田裏，大多種的是小米、高粱，它們耐旱。每到雨季，人們選個日子播種，之後除了鋤草、施肥，便指望老天澆灌。

我在這些遺蹟間徘徊，想像着當年的場景，心中湧起一股莫名的感動。站在山頂，俯瞰山下熟悉的房屋、田野、小路。小時候的村莊，是麥草屋的世界。那些屋頂覆蓋着厚厚的麥草，遠遠望去，像是一個個溫暖的巢穴。麥草屋冬暖夏涼，雖簡陋卻滿是生活的煙火氣。屋簷下，常見人們掛着一串串辣椒和玉米，那是村民們辛勤耕耘的成果。而如今，麥草屋已不見蹤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紅瓦房。它們整齊劃一地排列着，屋頂的紅瓦在藍天的映襯下，顯得格外耀眼，彷彿是歲月給予這片土地的嶄新裝扮。

下山途中，我們遇到了一位中年男子，他正開着三輪車往山上運送飼料，他家的豬圈就建在山腰。為了方便上山，他修了一條水泥路，直達他家飼養場。他停下車，抬起頭，臉上露出質樸的笑容。我走上前和他攀談，想問問他對這個村子的記憶，還有那些我曾經熟悉的人。我問：「你認識某個人嗎？」他搖了搖頭，表示不認識。我又提到了另一個人，他還是搖頭。我有些失望，但還是指着山下一個目標，繼續說：「我是在那個院子長大的，我在這裏長到18歲。」

他聽了之後，眼睛裏閃過一絲光芒，說：「哦，那個院子我知道，我小時候還在那個院子裏玩過呢。」我驚喜地問：「你知道我是哪家嗎？」他說：「你是賀家吧？你父親當年是清廉有名的幹部，我們都聽說過。」聽到這些話，我的心中湧起一股暖流。父親不僅是一位清廉有名的國家幹部，他還曾是一名軍人，為了保家衛國，奉獻出過熱血青春。

這次回鄉，讓我對「故鄉」二字有了更真切的體悟。

山的那端，是記憶的根。故鄉，就是記憶的根。在歲月的長河中，那些記憶、那些故事，如同眼前這座山的輪廓，深深鐫刻在我的生命裏，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它讓我明白，無論未來的路有多漫長，故鄉的山、故鄉的水，以及融入靈魂的故鄉精神，都會化作血脈中的滾燙，成為心間最堅實的壁壘，伴我無畏遠方，踏出堅定而從容的回響。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朱紫嬈重拾「勇敢」

人的緣分是很奇怪的，我和剛簽約新公司出新歌的朱紫嬈的緣分竟是來自她的雙親。那年是她的雙親約我到海港城一間飯店相見，其實我們並不認識的，也忘記了是誰介紹兩位來找我，後來知道他們的女兒入了娛樂圈，準備在音樂方面發展，如果是黎小田帶她入行，那便應該是小田提出請朱生朱太找我。自此之後，我便開始比較留意這位女孩子，就這樣斷斷續續地知悉一下朱紫嬈的狀況。

不過，除了工作之外，我們沒有其他交集的時候，直至去年一次在某食肆招待去嘗新，忽然有個女生走過來跟我打招呼，我轉頭望望還以為佘詩曼，其後才發覺是朱紫嬈。到最近知道她簽了新公司，而且還出了新歌拍了MV，步伐一下子快了很多，想知道她的狀況，找着她談談，聽聽她的想法，也希望她能夠打開局面，償心願做自己想做的東西。

她說跟天盟娛樂的培哥偶然認識，得知她約滿邵氏，又知道她仍然好想在音樂方面發展，後得到培哥的支持，她很快便成為他公司旗下的藝人，而且迅速地做音樂。培哥給予她很大的自由度，也很上心給予她最大的助力，為藝人爭取很多東西，她感受到這位老闆的誠意和心意。

她坦言自己的心態是轉變了，以前很介意別人怎麼看自己，做什麼都很小心，生怕所做的會影響到別人對自己的看法，現在她學會尊重自己，做適合自己、想做的事情。她感到那轉變是很大，人也開心了很多。

原本她在英國讀書是學音樂的，回到香港卻加入了娛樂圈，過去的日子她把很多所學的東西都放低，直到近年她得到朋友柯大衛的邀請，大膽地接演了一個英文音樂劇，她說自己任性了很多，既然他選擇了她，願意接受唱了流行歌曲多年的她，也因此令她的「勇敢」回來了，把她多時的「焦慮」踢走，她還重新坐到封塵的鋼琴前，為她的新作寫音樂。

●遇到重新出發的朱紫嬈（右）。 作者供圖

鵬情萬里

趙鵬飛

北京有點藍

人到了某個年紀，就會喜歡聽戲，聽的不是戲文裏的仁義忠孝，是細樂慢挑的一詠三嘆，還有唱念做打時的有規有矩。人到了一定年紀不由自主地會憶舊、會念舊，會在對昔日的追想中梳理一段段不曾與人言的往事。北京是一個容易讓人陷入舊日情緒的地方，尤其是春將未將之際。街巷兩旁的楊樹高大挺拔，光禿禿的粗大枝丫氤氳在濃重的霧靄裏，騎着車子眺着前方，深灰色基調的城市，街上車水馬龍，人人衣裳臃腫，遙遙的黃綠隱隱浮在垂柳的千縷萬條上。視線裏總有色彩艷麗的共享單車，在樹下排成一排，總有衣着艷麗的外賣員，在樓下扎成一堆。

●首都賓館的臘梅花

古老的城門樓子前川流不息，湧動着的面孔新奇興奮。總要來看一次心目中的首都，總要來拍一張照片的天安門，以及天安門前的廣場。寬大齊整有序是政治，雜亂擁堵渾濁是生活。高原紅斑塊的臉頰，印花頭巾遮不住的風霜，醬色無簷絨線帽下的垂髮，在肅穆的長街上捨不得邁開大步。復甦的青澀青春，遠去的夢寐夢想，如願和失落，期待和惆悵，記憶晃動，幻影疊加，情緒上的起起落落，難以描摹。

天藍的時候，左安門的梅花山桃出塵飄逸，首都賓館的臘梅明黃耀眼。天灰的時候，建國門大街邊上的玉蘭花灰頭灰瓣，護城河的水色失去了濾鏡加持，波光浮動的水面上，仍有人在游泳。神武門前加裝了一道鋼鐵柵欄，午門前也有柵欄，崇文門寬大的十字路口，每個來去的方向也都橫有柵欄，交通燈變化，柵欄伸縮，路人和車輛或走或停。過南池子大街門洞要刷身份證，過王府井地下通道，也要刷身份證。

夜色初上，什剎海半明半暗。銀錠橋一帶熱鬧喧囂，酒肆食店的霓虹招牌亮起，勾勒出鳥獸房舍的輪廓，絢爛色澤釋放的情緒，勾起遊人想要靠近的衝動。沿着水岸往深處走，一盞盞散發橘黃色光芒的半高立式路燈，杵在彎彎繞繞的小道上，風拂柳動，行人寥落，頗有些楊柳岸曉風殘月的意境。前清的乾隆帝，竭力要把江南玲瓏水鄉搬回京城，煙嶂翠屏，水影波光，重樓飛簷，人影婀娜，生活裏的美學，詩詞裏的意向，都只為成全心裏的溝壑萬千。雖才情不濟，也無名句，他一生所做詩詞數量之多，比肩收錄2,200多位詩人詩作的《全唐詩》。

香港西九故宮長年展出的清宮文物裏，有不少跟乾隆帝的起居有關。我去觀賞過幾次，對其中一幅《是一是二圖》印象深刻。畫中的乾隆帝身穿漢人服飾，端坐榻上，其身後的山水畫屏風上，懸掛着與乾隆樣貌衣飾一樣的畫像，畫中畫，一左顧，一右盼，相映成趣，與乾隆在畫中題跋：「是一是二，不即不離。儒可墨可，何慮何思」意境呼應，很容易令人想到莊生曉夢迷蝴蝶的典。駐足畫前略做思量，眼前景又跟六祖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無端端牽連起來。明心見性是靈光乍現，苦海磋磨才是常態。

我有時候會胡思亂想，倘若萬物果真有靈，那些曾來過一遭塵世的生靈，是不是都附在累世積澱的塵埃上，端看着眾生沉淪在貪嗔癡裏而無動於衷？好比乾隆帝坐在半空裏，看着趴在《是一是二圖》前糾纏儒墨的我們而拈鬚自得！又好比北京湛藍天空上流過的雲，用見慣了世事的悲憫，降下一場不期而遇的春雪。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尚未成形的《人間蒸發株式會社》

看《人間蒸發株式會社》，是一種非常Netflix或Disney+的體驗，尤其是在以上平台由外國人製作的日本劇目（無論是戲劇、動畫又或是紀錄片），其實都有一種隱藏的製作/觀看邏輯。

容我挪用一種不盡準確的定性——那是一種「東方主義」的變奏。是的，正是薩依德的《東方主義》。當年的「東方主義」，旨在把東方他者化、邊緣化，把東方當成西方的對立面，即東方是「他們」，塑造西方幻想中的東方世界。這被用來凸顯西方文化的優越，成就歐洲自己的主體性及文化認同。此刻的「東方主義」，再沒有西方文化的優越，但對東方的他者化及邊緣化從沒止息——正如導演Andreas Hartmann所言，「夜逃」式的搬家公司之存在，「除了聽聞過美國會有公司為明星退隱以外，這種職業在歐洲聞所未聞。」

當然，始作俑者應是《AV帝王》，因此作的大賣，於是才有近親繁衍的《相撲聖域》《極惡女王》出現。是的，男女易位，由相撲到職業摔角——無論背後有多少業界田野調查的基礎，其實背後其理同一：都是繼續販賣日本文化二元矛盾性的神話（又或名之為共犯式鞏固建構），以便合理化獵奇下去，那是娛樂片的運作邏輯。當然，《人間蒸發株式會社》屬「誠意」類製作，但背後的獵奇視角，其實差異不大。

我不是說製作方並不認真，據說已花了6年經營，而且也不斷強調正因為是外國人，所以才取得受訪者的信任。只不過從成品而言，尚未完成大抵是普遍的印象——當中「夜逃屋」主腦的關鍵發言、紀錄片中的人物的下場等，仍大多付之闕如。最終我們或許並沒有較薩依德筆下的年代進步多少，仍然停留在旁觀者的日本視角中。